

从话语构序到媒介构序

——基于数字媒介化的本体论之思

董 翟*

摘要: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话语 媒介化 媒介本体论

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的开篇,基特勒(F. Kittler)(2017)如是写道:“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这里反映出,至少在现代性语境下,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作为问题,也许向来重要,但在今天尤甚——数字时代语境下,无论是否知觉,人的生活从个体层面到集体层面近乎必然地为可见或不可见的媒介关系所中介着,并且这种关系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异于人掌控的独立性。媒介并非——至少并非仅仅作为人的工具而存在,也并非仅仅是内容借以传播的“无辜”中介,这是自伊尼斯(H. Innis)和麦克卢汉(M. McLuhan)以来创生的媒介理论早已充分予以指认和讨论的境况。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媒介理论历来存在传播学和哲学的二元底色。前者偏重于社会学式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媒介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功能、作用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这固然提供了大量实证的结论,但往往囿于表象和具体,难以从中直接得到具有现实抽象意义的总体批判视野。新近的媒介反思

* 董翟,南京大学哲学系。

也对此有所自觉,并更多力图以哲学的视角运用存在论等对媒介进行观照,但也存在以理论反注现实的“具体性错置”、缺乏对媒介在技术和社会不同层面发展实际的观照而流于空疏等不足;同时,也正因为缺乏对现实系统、深入的认知,所以现实抽象层次的探讨无从谈起。建立媒介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在现实抽象的基础上提出媒介本体论的新批判范式,是媒介理论必然需要拓展的向度。

这方面探索的另一困难在于模糊性。单是最基本的“媒介”概念,在定义上便千差万别。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也许是广为人知的一例,但如果不加限定,则这一概念的对象几乎可以推展到一切可以与人产生关联的物,甚至人本身也概莫能外。为保证讨论聚焦明确,本文主要基于丹麦媒介学者夏瓦(S. Hjarvard)对“媒介化”的定义探讨媒介问题,即区别于中介化研究——仅仅将媒介当作可以选择使用的传播意义上的手段和技术的研究范式——而将媒介视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夏瓦,2018),作为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机制和场域性的存在来加以探讨。在讨论的社会历史层面,主要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聚焦数字时代媒介的当代变化。

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福柯(M. Foucault)对“话语塑形”的分析为导引,通过福柯已经指认出的话语构序机制,及其变化中发现的作为背景而遭到忽视的媒介之物质性能量,将对话语构序的分析在媒介化意义上予以重构,显现出媒介化时代媒介的构序力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以“横向”“纵向”两个维度的媒介化,展现数字时代媒介化的特征,并由此在一种可能的方法论构式上,探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如何重新理解人、资本与媒介的关系,人在媒介化时代下的处境,并构建更合理的“人—媒介”共生的存在方式。

一、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一改之前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对不同时代“知识型”断裂进行考古学分析的研究思路,将作为实践的话语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在对话语的分析中,福柯力图指认在话语实践的运作背后,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而存在的“话语塑形”过程,即“一种确定话语实践本身特征的关系之建立……一组内在于实践的和在其特殊性上确定实践的规则”(福柯,2021)。在这一分析中,“词与物本身一样,都是有意缺席的”(福柯,2021)。如同胡塞尔

将对象的存在先行“悬搁”一样,话语的内容——无论是话语的对象,还是话语的语言学意指关系——都必须首先去在场化,从而回到话语本身,让“决定话语对象的弥散性的连接”(福柯,2021)得以显现。

为了让讨论聚焦于话语本身,福柯重点区分了“话语”本身层面的基本单位——“陈述”与“命题”“句子”和“言语行为”三者的区别。与逻辑层面的命题不同,陈述不需要满足命题结构和构成规则的限定,不同的陈述可以在命题结构上是同一的;与语法层面的句子不同,陈述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句子,甚至不能简单从语法特征、语言要素的层面去定义,且陈述未必只以语言的形式构成,如图表也可以构成陈述;与表达层面的言语行为不同,一个言语行为可能需要不止一个陈述,而陈述也并不是在言语行为已经规定好的连接序列中确立自身,恰恰相反,言语行为被陈述所定义,其序列是在个体化的陈述中形成的:总之,陈述与以上三者都处于不同层面,并且先于以上三者的结构秩序而存在,“不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本来就属于符号的存在功能”(福柯,2021)。

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构序并非稳定连续的结构,甚至并非此前“知识型”分析所指认的虽然存在断裂但在一定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结构,而是话语在现时话语事件中的形构“塑形”过程,它在前概念、前结构的话语本身层面运作,从而组织话语诸概念、结构的秩序。

然而,福柯的话语构序分析并未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如同《词与物》的“知识型”实际上是“事物的秩序”一样,话语的构序进而延伸到陈述的主体与客体,从而话语塑形的过程也成为塑造主体与客体的过程。陈述主体并不是先在的决定被陈述的话语的创造者,“各种各样的陈述样态非但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某种综合或某种统一功能,反而显示着主体的弥散”(福柯,2021)。陈述主体只是弥散在陈述的场境中,由陈述塑形的一个临时主位;陈述客体也并非先在于陈述之外,只是被简单移入陈述中的实存,是“只在话语中才出现的、有规则的对象形成”(福柯,2021)。由此,话语的分析实质上是关涉话语所构建的场境中主体与客体存在方式的探讨,因而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深刻意涵。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理论延续了福柯这一话语分析的思路:对象上,同样关注的是在话语内容之外,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而存在的话语生成场境;方法上,同样依循考古学的方法,考察被话语可见的连续性所遮蔽的权力构序对话语以及对由此延伸的话语中的主体、客体的生产;视角上,同样将话语分析置于本体

论层面的深度,揭示话语场境作为本体论构序的实质。然而,不同于福柯仅仅在话语本身的层面探究话语实践中通常不可见的言语运行规则,基特勒将目光投向了话语实践的深层基底,即言语运行所必需的物质性能量——媒介技术。在基特勒看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缺乏深入媒介技术的体认。这一局限性只有在媒介充分发展、数据处理方法打破原有作为权力根基的信息持存和传输垄断时才会显现,这也使得“福柯的历史研究并未在 1850 年的历史之后进展多少”(Kittler, 1990)。诚然,这一重构其实在福柯的意义上并未逾越其话语塑形分析的本体论界限,因为福柯所指认的话语并非仅仅作为媒介传播内容的意义层面而存在。基特勒的分析,与其说是原先层面话语探讨的延续,不如说打开了另一个讨论维度。虽然隐含了不同层面言说的转换,但并不影响其在重构语境下的新意义。

在《话语网络 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中,基特勒将“话语网络”界定为:“技术和制度的网络,这些技术和制度使特定的文化得以遴选、持存和加工相关的数据资料。”(Kittler, 1990)这一描述所指认的话语网络,与福柯话语塑形分析中所指认的话语生成和运作的场境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只是将这一场境的观照移入媒介层面,其共同目的都在于揭示作为表象呈现的话语背后的历史先验前提。在将“知识型”断裂的追问延伸到媒介层面之后,基特勒指认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两个断裂节点的媒介范式转变——断裂节点的选取显然也带有福柯对古典时代到现代知识型界分的色彩。书写与印刷媒介的发展、普及,为 19 世纪的话语网络奠定了物质性基础。由此,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话语体系在教育、语言观念、文学艺术等领域得以建构。20 世纪的自动化媒介则将话语网络从所指的意义层面转向能指的符号层面,打破了能指到所指的线性结构,也让心理分析话语体系得以可能。与福柯的话语塑形相似,话语网络同样塑造着其中的主体,如 19 世纪语言观念的转变使得女性在教育中的地位由于口语传授而变得重要,20 世纪自动化媒介又取消了口语传授中教育者主体的稳定位置。

根据基特勒自己在后来访谈中的指认和国内学者对其思想路径的梳理,这一话语网络分析范式其实隐含着香农(C. Shannon)“信息论”的思想影响,实际上是异于原有的文学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的新范式的出场,以及在北美技术哲学跨学科延展的语境下对原有话语理论的重构(车致新,2019)。

到了《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中,经由对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所代表的三个向度的自动化媒介的聚焦,基特勒的媒介物质性分析范式正式从此前隐于文本话语分析之后的“隐微写作”走向了前台。在书中,基特勒将留声机、电影、打字机这三种媒介及其所代表的媒介物质性范式,与声学、光学、书写的数据流区分,以及拉康(J. Lacan)意义上真实界、想象界、象征界的区分分别对应起来(基特勒,2017)。

留声机所代表的声学媒介体系,其特征是前意义化过程的真实直接复现。无论是记忆还是书写形式的再现,在呈现之前都已经潜在地经历了既有意义体系的遴选和意义赋予,这一过程垄断了语言,将给定意义体系之外的语言杂多排斥出可见的领域。然而,“‘录下的语音从不会说谎’,它的技术存储可以揭露‘隐藏’的内容,可以让‘过去’……口吐真言”(基特勒,2017),经由不加区分的语音记录(无论其是否可意义化为可解读的语言),既有的象征能指链被悬置,过去真实的在场得以显现。在这一意义上,对于话语本身的细节切分和分析成为可能——弗洛伊德(S. Freud)的精神分析正是基于这一切分,为了使被治疗者说出关于自我的真相,医生恰恰需要像留声机一样不加区分过滤地倾听,避免自身理智的意义体系审查、压制被治疗者的胡言乱语,从而让被治疗者的无意识得以显现。精神分析由此和留声机媒介技术形成了一定的同构性。然而,留声机媒介技术同时也构成了突破精神分析的力量,因为它的真实最终将超越一切书写权力及其背后的象征秩序——即使是自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基特勒,2017)的精神分析对歇斯底里的话语的书写也概莫能外。诚如基特勒所举出的一例,当被治疗者持有留声机时,情况就发生了倒转,“分析师现在变成了研究对象”(基特勒,2017),精神分析自身的话语垄断也会被真实界的力量所打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留声机媒介体系的真实是不存在任何构序性的绝对本真或无中介的真实,真实只意味着留声机媒介体系在媒介构序中所占据的位置。在悬置和突破传统的话语构序界限的基础上,留声机媒介体系同样生成着新的话语构序,例如留声机从出现之初就带有调节回放速度以对听觉事件进行时间轴操纵的功能,录音磁带的出现为声音的拼接和调节提供了更多可能——如果借用斯蒂格勒(B. Stiegler)的说法,声学媒介同样作为一种“第三持留”对人们的意识时间起着塑形和赋序的作用。

电影所代表的光学媒介体系,其特征是基于特技和蒙太奇的对时间意识的重构。电影媒介体系在结构上并不适合与真实世界发生直接联系——在物质性基底上,声波是低频的一维数据流,光波则是高频的二维数据流,相应的处理容量要求更大。直到光纤技术普遍推行之前,光波一直缺少直接储存和处理的媒介,实时视觉信号处理在很长时间内是无法实施的。然而,电影媒介体系先天具有适于遴选和剪辑来重构数据的优势。这既是电影本身无法直接输入光波数据的限制所决定的,也是其可以借助频闪和余像效应来制造幻觉拟真性的特点所赋予的。“现实中的切剁或剪辑,虚幻中的融合或流动”——这既是电影媒介体系自身的悖谬逻辑,又是电影虚幻与现实交织特性的极好诠释。正因如此,电影媒介体系,如其所对应的想象界一样,是在虚幻镜像中对自我的误认之呈现。精神分析话语的功能与之类似,以其话语将真实界的歇斯底里的话语加以意义再现。正因为如此,疯癫经由对真实的记录和再现被精神分析话语建构出来,共同的逻辑使得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精神病学因媒介的支持而更为强大”(基特勒,2017)。

这同样并不意味着电影媒介体系不具有真实性,恰恰相反,“电影比真实更真实”(基特勒,2017),其本身模糊了真实与对真实的建构之间的边界,在电影媒介体系的逻辑中,复制就是制作,反之亦然。电影对想象中的身体画面进行剖析,从而“赋予人们一个想象的自我”(基特勒,2017),灵魂、内在的自我和个人在电影媒介镜像的重构下只是伪主体的不同代称。

不同于前两个媒介致力于生成原先书写媒介之外的新构序,打字机所代表的书写媒介体系的特征是对原有书写垄断构序在物质基础意义上的倒置。这同时也构成了对主体的塑形,原先男性垄断的书写权力随着工业化、自动化对书写性别象征的抹平而失去其独有性。除了女性之外,原先同样被排斥于话语体系之外的失明或失聪的残疾人也获得了书写的权力。

这并不仅仅是工具的掌握者和使用者意义上的转变,而是媒介场境的转变对主体存在的基底性影响。换言之,打字机并不是以无辜的工具身份介入人的生活的。海德格尔(M. Heidegger)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指认打字机对寄托于手写的存在关系的侵入的,“当书写被从它的本质来源,也就是手那里脱离,而代之以机器打字,那么其存在对人的关系就发生了一种转变”(海德格尔,2018a)。尽管海德格尔是在消极意义上言说这一转变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技术存在

于我们的历史中”(海德格尔,2018a)。媒介技术对人的存在关系、存在方式的介入是深刻而不可逆转的,打字机媒介体系实现的就是对基于原有手写书写构序的存在方式的倒置。在肯定性的意义上,这同样意味着新构序对存在方式的重塑。由于视力的严重下降,尼采开始使用打字机写作,而这一书写方式的变化也参与了他的思维过程,让其写作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从长篇大论变成格言警句,从哲学思考变成一语双关,从善于辞令到电报式的短小精悍。”(基特勒,2017)

分裂为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的三个现代媒介体系,又可以实现不同数据流的重新聚合。正如拉康曾指认的真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之间可能的关联和耦合一样,“先从心理上分解成碎片,再从物理上进行重建,中央神经系统借此获得重生,但却成了一个由不同分身构成的魔像”(基特勒,2017),话语网络由此在媒介基础上完成了对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三个现代媒介体系也共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即从美国内战开始的声学、光学和文字存储技术的出现,从一战开始的与各存储技术相应的电子传送技术的出现,以及从二战开始的将既有媒介体系在新兴信息技术中的新应用。最终,三个分化的现代媒介系统合于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控制论体系中,“自动化的话语分析已经开始发号施令”(基特勒,2017),媒介话语网络实现了对自身的再生产。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将媒介技术的力量引入原有的话语构序分析中,并将话语构序延伸为话语之下作为其物质性基础的媒介构序:一方面,揭示媒介自身演化的“自主性”,即媒介网络对自身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揭示媒介作为生产场境,对话语以及栖居于话语中的主体、客体的再生产。

总之,从福柯的话语分析到基特勒的媒介分析,从作为本体论式的构序场境之话语到作为本体论式的构序场境的媒介,在媒介场境中对包括话语的陈述实践——在福柯的意义上,这一实践再生产着其他层面的社会关系——在内的诸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初步得以揭示,进而对媒介构序的探讨,即在媒介语境下对当今人与物处境的探讨也就成为可能。

二、双向度的断裂:数字时代媒介化的特征

既然揭示了话语—权力构序—媒介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从社会的话语分析语境延伸到了作为物质性基底的媒介语境,而要进一步揭示在数字时代媒介的运作方式,就必须关注当下社会媒介化所呈现的特征。在这一向度上,经由对传播学、技术哲学等不同领域学者既有相关探讨的梳理,本文认为,当下的媒介化其实呈现着横向和纵向两个向度。然而,这两个向度并不是相互平行的关系,而是经由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同一媒介化进程打开的一体两面。横向媒介化更多侧重于媒介化的表象具体层面,更加贴近日常对于媒介的感受和理解。纵向的垂直媒介化实际上是对横向媒介化表象之下的纵深揭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的物质性能量以及由之建构的媒介权力构序才得以显现。

(一)横向扁平原子化:“伦理区分”的消亡

海德格尔在《物》的开篇论述了物在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中的存在处境,即距离的消失。如其所言,“一切都被冲入这种千篇一律的无距离状态之中,都搅在一起了”(海德格尔,2018b)。也许并非着意,在对作为这一进程之背景的“无线电”“电影”“收音机”的指认中,海德格尔实际上隐性呈现了现代媒介化社会中万物的存在图景。横向媒介化之谓扁平原子化,其首要含义正在于由现代媒介技术对个体生活世界和整体人类社会的介入而制造的对物与人存在意义上的“抹平”。

距离的消失并不等同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作为此在在世方式的“去远”。虽然后者同样意味着“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海德格尔,2018c),但却是在此在建构与其他存在者的切近存在关系的存在建构意义上开展的。相反,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媒介技术导致的距离的消失,是一种暴力的去远性,在这种去远性中被抹去的不仅仅是距离,甚至连此在去远的存在建构本身也一并被抹去。此在并不能在这种距离的消除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一席之地,恰恰相反,位置本身成为问题,因为一切都处于同质化的无位状态。张一兵在对维利里奥(P. Virilio)的速度论中所论及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分析中,对这种暴力去远性也有所指认:“这个去远性中发生的光速接近是真实在场的数字化伪像,因

此是败坏的接近。”(张一兵,2018)这种同质化不但消除了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消去了真实在场与数字伪像之间的差距。

对这一处境的担忧,也正是海德格尔在《物》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重新探寻物之物性的提出缘由,存在的千篇一律正在取消物之物性,换言之,即物自身的存在。相比之下,对可能的核战争,即原子弹、氢弹对物的毁灭的恐惧只是在“令人惊恐的东西已经发生”(海德格尔,2018b)之后的无助而无谓的恐惧罢了。然而,即使是海德格尔最终诉诸的“天—地—神—人”的四方映射游戏,实际上也无从将物从这一毁灭进程中拯救出来——数字媒介已然将这四方本身的存在统摄于其中(至于这一进程如何进行,将在之后的垂直媒介化向度上再加以讨论)。

如果对《物》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主—客”二分框架中作为客体的外物的存在样态层面,将这一处境仅仅视作与人无涉的“物”的处境,那么恐怕海德格尔就必须跳出来指认:“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事实上,物的存在与此在的关涉性,注定了物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命运。除了前述存在建构层面讨论的物之存在的消隐对此在存在不可避免的影响之外,如果将这一讨论投射到当代生活现实中日常具体的存在感知,就不难发现,一种无差别的原子化构成了媒介化背景下人的存在方式。韩炳哲在其媒介批判著作《在群中》中,将当代社会中媒介所塑形的人的存在处境和社会关系归为“汇集而不聚集”的原子化个体群。原子化个体群相异于勒庞《乌合之众》意义上聚合的群体:勒庞所说的群体是中心化的,围绕少数中心意志而团结的无意识个体,而这些个体会聚合成思想高度一致的力量;然而原子化个体群则是去中心化的,其特征是“没有灵魂,没有思想”(韩炳哲,2019),即不存在中心化的群体意志,其组成个体只是偶尔地汇集,并不能将个体消融于群体中而聚合成为有方向的力量,只能产生反复无常和支离破碎的噪声。

在社会层面,这一原子化处境正源自数字媒介所塑形的媒介场境特征,而在韩炳哲的媒介批判中,作为其讨论前提的数字媒介的结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无距离感、匿名性、即时性和对称性。

无距离感显然和海德格尔所说的“距离的消失”颇有相合之处,而韩炳哲所侧重的在于距离消失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边界模糊化。由于社交媒体将信息生产转入私人领域,隐私成为可以被公开展示的内容,原先对于隐私的尊重不复

存在,这一过度的无距离消解了尊重的基础——尊重的本义就在于“有距离的顾及”(韩炳哲,2019),是从无距离、无界限的窥探中区分出的对距离的适度保持。

匿名性实际上意味着人的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信息与发布者在数字媒体上的分离性。由于姓名是承载着责任、承诺等的现实身份之象征,也是人作为公民进入社会并被社会认可的基础,匿名在消解与姓名的这一关联时,也将对自我的社会约束以及对他人所负有的社会责任一并消除。

即时性消除了在传统通信方式中的延时性。在延时性的交流模式下,最初的愤怒等极端情绪尚未表达就已消散。而即时性通过对这一缓冲空间的取消,为未经反思的冲动发泄提供了便利的出口。

对称性即数字媒介的双向互动特性,在数字媒介中,“不存在明确的等级,把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区分开来”(韩炳哲,2019)。这意味着信息发布不再是中心化的、垄断的权力,垂直单向的权力秩序被完全抹平,充斥在数字空间的信息是去中心化的无序逆流。其中,“网络暴力就是一种带有所有破坏性特征的逆流”(韩炳哲,2019),是这种无序性的极致展现。

这四个方面的特征,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媒介在用户层表象层面的特征,也大体符合人们日常对数字媒介接触和运用的体验。其实,这四个特征是前述海德格尔“距离的消失”在不同方面的具体展现。除了显性的无距离感以外,匿名性是身份上无距离的同质化,即时性实际上是时间上无距离的真实在场与数字伪在场的同质化,对称性是这种无距离感所带来的扁平化体现,这种扁平化消除了建立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某种向度秩序的可能性。

此外,在数字媒介化时代,不仅经由媒介中介的人与物的存在被抹平了,媒介的普遍数字化让不同媒介之间的差异也被抹杀,这构成了横向媒介化呈现扁平原子化特征的又一向度。基特勒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的绪论中对此早有指认:“光纤网络遍天下……信道和信息数字一体化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体差别。”(基特勒,2017)一方面,各种媒介在数字化意义上实现的互联互通诚然构成当代社会生活中诸多便利性以及相关产业经济运行的基础,这是日常生活经验已然呈现的,这一趋势同时也表现为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生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不同媒介边界的日益模糊,基于不同媒介生态之间的差异域保留的外在性敞开空间已然越来越小,差异日益受限于可控的同一性所掌控的范围。

福柯在其最后的讲座集《说真话的勇气》中,不同于既往对权力塑形主体过程的解构,反而着眼于“直言”主题,关注并寻找一种关于“直言”的肯定性主体建构伦理。“直言”的字面含义即“说真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顾忌、没有原则地乱说,也不是只说不会对自身产生威胁的真话,而是承担违抗权力或冒犯他人的危险的不加矫饰的表达,它承担着以逻各斯辨明真理和揭示真相的作用,同时也是建构主体自身以及主体的真实生活所必需的实践。对于“直言”的伦理而言,与之相伴随的,被福柯所指认为“伦理区分”的区分机制是必要的。这种机制借由逻各斯的运作而具有辨别真假善恶的能力,从而让真话在话语场中得以凸显,导向一种积极的伦理建构。在福柯看来,毫无区别、人人皆有发言权的民主并不利于直言,因为“在民主中,伦理区分不管用”(福柯,2018)。缺乏选择机制的民主无法区分真假善恶,也无从让直言者获得公正的对待。相反,由于“直言”并不谄媚多数人的意见,在无差别的民主中,其几乎一定会成为被排斥的对象。前述对数字媒介化横向维度的批判分析所指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抹平”逻辑,导向的结论正是与“伦理区分”的分析最终同构的——数字媒介化所创造的话语场境,其本身的特性正在于以暴力取消了话语实践中的区分和边界,由此带来的失序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排斥社会话语场中进行伦理区分的可能,其结果体现为话语场中呈现出的诸乱象。因而,基于横向维度的媒介化分析常常描绘的“后真相”,即一种与真相关系的紊乱带来的普遍化失真这一图景,实际上构成了整个横向媒介化分析的缩影。这一分析逻辑诚然在日常媒介体验中是充分自洽的,然而自始至终不难发现,这一逻辑并未逾越本身剥离出媒介分析维度的“伦理区分”分析逻辑,本质上无异于对“伦理区分”的消亡这一主体伦理逻辑套用媒介语境的改写。横向媒介化分析的局限性正在于,其本身并没有真正深入媒介层面,缺乏对媒介物质性本身的反观,从而成为“无媒介的媒介分析”,套用媒介语境的话语分析,最终揭示的仅仅是媒介化呈现给我们的可见表象。对这种局限性的克服,将最终把我们引向对垂直媒介化的认知。

(二)纵向垂直控制化:新权力构序的诞生

媒介环境学的先驱麦克卢汉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看门狗比喻”：“媒介的‘内容’好比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力。”(麦克卢汉,2000)对媒介传播内容的关注,恰恰构成了在内容的背景层面

运作的媒介本身结构的遮蔽。同样,如果对媒介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媒介通常向人们呈现的用户层表象,实际上也是对界面背后真正塑形了表层场境的基底的遮蔽——而这正是前述讨论中横向的媒介化逻辑常常忽视的向度。

福勒(M. Fuller)在《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中指认了通常被认为是“非物质”的电子媒介领域,反而恰是对媒介物质性的关注“最有收获之处”(福勒,2019)。在用户层面看似非物质性的数字空间,实际上是有待解蔽的复杂物质性媒介系统的运作结果,而媒介生态所关注的正是在媒介的动态作用中物质性的结构驱力所创生的生成性力量。这种生成性力量,福勒将其与尼采(F. Nietzsche)的“权力意志”、德勒兹(G. Deleuze)的“生成机器”和道金斯(R. Dawkins)等人的“模因”理论等相联系,表现了媒介场境的自我生成性。

在福勒看来,对媒介物质性的忽视本质上是本体论层面的形质论传统的延伸。在形质论中,形式和质料是二分的,形式外在于质料并且被赋予质料,从而让质料得以赋形;然而,在媒介实际的运转和演化中,“物质材料在同存在于其周遭的形态发生能供性的关联中生成其自身的形构能力”(福勒,2019)。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媒介物质性层面的生成性与前述讨论中福柯所指认的话语塑形、基特勒所指认的话语网络的媒介塑形颇有相通之处。其实,这是不同层面对形质论、本质主义的超越,也是对媒介生成性、媒介体系自身再生产机制在不同粒度上的言说。

福勒从四个方面延伸了对这一指认的探讨:从对媒介的边缘运用中交叉使用媒介系统的案例,即英国曾经流行的海盗电台切入媒介发展的历时性进程,揭示对于媒介要素的组合如何生成新的媒介;聚焦于照相机这一媒介对象,并由此分析其物质性结构与生成外部关系性的共时性机制;深入媒介预构的标准对象的形成机制,以及在特定环境下的媒介标准对象生成新的意义和功能性的可能,将标准对象的生成与对怀特海(A. Whitehead)“具体性错置”生产性的解读相结合;借助复制性模因的概念分析媒介关系性维度的生成机制,展现在不同关系性维度的复制和转译中所实现的媒介的可能性生成网络。

福勒的媒介生态学关于媒介内在生成性的指认,至少在两个层面拓展了对媒介的言说可能:其一,媒介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内生系统,并不能将其仅仅作为内容的载体来看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向人所呈现的媒介内容的表象层面来加以探讨,而要突破传统的形质论二分框架,深入媒介的物质性基底来探寻其

自身的塑形和再生产方式;其二,媒介并不是可以被孤立研究的具体对象(某个媒介物、某种媒介技术等),也不是某种观念抽象的泛化媒介概念(万物皆媒介,词源学、语义学意义上的媒介概念等),而是需要关注实际存在和运行于界面之下的潜在媒介机制,关注交错的媒介关系和媒介层面,从而对其进行带有现实抽象意味的整体动态的考察。在这样的意义上,对媒介的考察从平面走向纵深,看似扁平的媒介场境在实际上被揭示为纵深的媒介物质性构序所生成的在特定视角下的表象结果。

布拉顿(B. Bratton)在《堆栈:论软件与主权》(*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中,正是在这一纵深维度上展现基于数字媒介的“行星规模计算”时代的政治地理构序。而这一构序,正如媒介生态学所揭示的,是各个不同层级的媒介布局的交错和结合:“当我们将大陆规模的基础设施、城市规模的普适计算和感知规模的环境界面联系起来时,我们将探索这些相互交织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构建、栖居、沟通和治理我们的世界。”(Bratton, 2015)

“堆栈”是对这一媒介布局的多层结构描述,是包括“软件、硬件和网络”(Bratton, 2015)在内的不同技术模块化、关联化的垂直性排列。这也构成了不同于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于扁平地图的权力地理布局的纵向复杂性辖域布局,“大地的法”延伸到“云法”,在这个意义上,前述海德格尔的“天一地一神一人”四方在一种普遍的可计算性和普遍的数字模拟中被消去了独立的存在意义。具体而言,“堆栈”可以分为六个层面:地球层、云层、城市层、地址层、界面层和用户层。这六个层面“从全球到地方,从地球化学到现象”(Bratton, 2015),在其交织的运算生态中实现其中各个个体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再生产。作为栖居于“堆栈”体系中的个体,“用户并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类行动者;它是系统中的一个位置,没有这个位置,它就没有角色或本质身份”(Bratton, 2015)。对用户而言,日常生活中通常可见的只是用户层和一部分的界面层(如各种应用程序的可视界面),而在这些层面上看似简单的操作却意味着纵深维度上相关联的各层面复杂的交互运转。这意味着,如同作为生产之结果的物背后遮蔽的是复杂的生产过程,用户所能接触到的媒介界面只是媒介体系层层中介之后的运算结果,其中的数据传输、算法机制等都被遮蔽于可见领域之外。

这些被遮蔽的过程和层级,在当代社会恰恰是媒介权力——如平台资

本——借以掌控和利用用户个体的平台权力的基础。祖博夫(S. Zuboff)(2020)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所指认的监控资本主义,以“无所不在的数位控制为媒介,将自身意志加之于人”的平台大他者,正是掌握了数字媒介体系的这些隐性过程、层级从而实现的基于数据搜集、传输、占有、利用实现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和掌控的媒介权力。

这种权力不仅仅作用于个人,更在社会层面以及传统的“大地法”的领土辖域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帕克斯(L. Parks)在《重思媒介覆盖》(*Rethinking Media Coverage: Vertical Mediation and the War on Terror*)中以“垂直媒介化”表现了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建立的基于地面、空中、光谱、轨道的全球垂直霸权。垂直霸权的向度拓展了传统军事争夺的领域,战争被吸纳到信道中,或者对信道的军事化,将军事、宣传、市场等社会生活各领域纳入总体战争中。这种垂直战略,就是“将国家的军事化和父权制等级制度自然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使其得以横向复制和扩展,渗入无数的生活领域”(Parks, 2018)。“9·11”事件之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就是这一进程的典型案例。除了进行直接空袭等对天空的军事化利用,美军还广泛开展心理战(PSY-OPS)项目,调动军用飞机干扰当地政权的电信系统,并播送美国军方和商业公司的娱乐内容,通过卫星、飞机、电信基础设施等媒介的综合利用来实现垂直控制。而在2002年准备对萨达姆政权发动战争时,美国利用空中广播,散播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政治宣传,并借助其全球监控能力,以及对全球信息传输的硬件、软件支配,向世界散播萨达姆政权的恐怖形象(Parks, 2018)。垂直媒介权力并不是和传统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等平行的权力,而是与这些权力深度交织和融合,成为其在当代语境下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同时,垂直媒介权力基于一定的媒介物质性结构,其自身结构驱力具有一定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就意味着其与传统权力模式之间存在张力,不能简单还原到传统权力的讨论范式中。

在媒介看似抹平一切的表象背后,是无法被还原到表象平面的垂直性的新权力构序借由媒介物质性基底而生成的幻象。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媒介所塑形的场境绝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正如韩炳哲正确指认了“更多的自由也就代表了更多的强迫”(韩炳哲, 2019)这一事实。然而,指认数字媒介化只是混沌无序的荒原,是一切权力和秩序都无法确立其统治性的领域,甚至认为数字媒介的无距离性是消除信息通达受众的中介层级的一种“去媒体化”(韩炳哲,

2019)体现,则无异于对唯有在纵深维度的观照下才得以显现的媒介权力构序的遮蔽。换言之,“去媒体化”的提法实质上是对“深度媒介化”的误认,媒介的不可见性并不意味着媒介的消失,而正是媒介的场境在纵深层面的扩展和水平层面的弥散之体现,媒介权力作为不在场的在场的大他者潜于其中。

三、媒介本体论:数字媒介化时代的生存思考

媒介本体论的提法,在基特勒的《走向媒介本体论》一文中早有讨论(Kittler,2009)。然而,基特勒的分析并不真正指向媒介本体论的具体建构,而主要是基于哲学史层面的回溯对媒介本体论之言说可能的探讨。本文认为,在当代,媒介理论走向本体论层面,绝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而是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人的处境,以及人、社会与媒介的存在方式的认知,是探索当代实践语境下更合理的人、社会与媒介间关系的需要。本文试图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在存在方式的意义上重构关于当代数字媒介化的思考,并由此提出肯定性媒介化的可能建构。

(一)从技术物到数码物:数字时代媒介本体论的基底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亚里士多德,1959),追寻“实是”(存在)就是要追寻存在的事物基底存有的实在(本体或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将媒介反思延伸到本体论层面,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构筑这一本体论场境的基础?

在前述讨论中,经过对水平向度扩展的媒介化表象层面的透视,媒介场境的基底已经被揭示为垂直层级上的媒介物质性结构,这一分析实际已然带有本体论言说的色彩。然而,“物质性”本身仍然是有待揭示的问题。原因在于,当我们言说物,尤其是言说人与物的关系时,物绝不是物自体式的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人呈现的意义上的存在者,而是关涉人,与人发生某种存在关系的存在者。既然如此,对物的言说就必然指向在一定范式下被揭示的物。

对媒介物质性言说的范式,显然并不能将媒介还原到现实空间中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广延(如具体的媒介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正如无法将人还原为组成人的种种化学元素——结构和关系并不能被排斥于物质性的讨论之外。而在数字

媒介时代,逾越现实空间意义的数字空间、非实体形式存在的数据等新的物象形式,也使得传统对物的言说范式显现出更明显的局限性。

技术哲学学者许煜将物在本体论思想史意义上的不同指涉界划为自然物、技术物与数码物三个阶段。实际上,对物的三重不同理解即三个不同的本体论范式的体现。自然物意指“将自然或人工的事物以同等的自然方式分析的范畴或视角”(许煜,2019),而这一范式所要求的就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即确定其独特存在的东西”(许煜,2019),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eidos)、康德的范畴等;技术物的讨论范式打破了自然物范式中常见的形质二分框架,将本体从实体转向环境或关系性的理解,如西蒙东所指认的“技术物是关系的统一体”(许煜,2019)、海德格尔在对“上手状态”的讨论中以关系互动的方式理解物等;数码物则基于普遍语言和普遍运算,“指成形于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物体,它们由受结构或方案(schema)管理的数据和元数据组成”(许煜,2019),数码物的讨论并不完全独立于技术物范式,而是对它的延伸,其所拓展的是与技术系统的物质关系维度,在这个意义上,聚集和综合社会其他系统的受算法控制的媒介网络以及其中个体之存在得以揭示。

因而,媒介的物质性,即媒介本体论的基底存在,不是主客二分框架下的客体物,也不是形质二分框架下的质料,而是在技术物和数码物范式意义上的构成对象,既包含实体形式存在的媒介基础设施,也包含非实体形式存在的数据和元数据,而不同形式的物都在媒介技术系统的网络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二)新掌控构序与异化:深度从属与媒介化的生命

如前所述,媒介在当代是作为塑形诸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而存在的,而对这种塑形方式的分析,以及在这一本体论场境中人的存在境况的分析,也就构成了这一本体论场境的运行机制,换言之即该场境的再生产模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区分了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马克思,2004)。在形式从属阶段,劳动虽然在生产关系上从属于资本,产出绝对剩余价值,但劳动的具体过程仍然是分散的,没有受到资本的直接掌控;而在实际从属阶段,劳动过程本身已经被吸纳到资本掌控之中,表现为集中生产。直到实际从属阶段,劳动生产力才完全从属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真正得以确立。从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

阶段的转变,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对经济关系的掌控延伸到对主体劳动本身的掌控,从而将资本主义掌控构序扩张到整个生产过程。

而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的掌控并不仅仅停留在生产领域。一方面,劳动的边界模糊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溢出传统的固定工时和工厂区域的限制,这意味着对劳动的掌控也随之广泛介入主体生活;另一方面,生产之外的领域也日益资本化,如巴里巴尔(E. Balibar)在《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广义剩余价值到总体从属》中所指认的,教育领域的标准化体系、竞争机制和教育资源私有化将人预置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人力资本;医疗领域通过对身体的量化掌控,将医疗由面向主体失常不适的状态,转向面向可被持续监测、持续纳入优化框架的身体指标,从而通过创造医疗需求的方式实现资本增殖(Balibar, 2019)。在这两个案例中,人的塑形过程本身被置于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中,资本不但在生产领域攫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自我增殖,也通过创造需求等方式实现自我增殖。与此类似的是,今天人的闲暇也并非自我规定的自由时间,而只是以资本所规划和预置的方式进行娱乐。由此,资本主义掌控构序延伸到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各领域中。据此,巴里巴尔在马克思“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总体从属”(total subsumption)的概念,表现资本主义掌控构序溢出生产的扩张。

诚然,这一指认拓宽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视野,在当代语境下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然而,如果回到马克思对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言说,马克思的这一区分本身并不仅仅指向价值增殖领域的扩展,也指向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的确立标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发展史中作为资本关键的质性变化(而不仅仅是数量或范围上的部分增加或扩展)。总体从属要作为其批判思路在同一层面的延续,就必须进一步指认这一概念在资本以及资本逻辑建构下的社会在质性变化意义上所具有的断裂性,仅仅对教育和医疗领域资本化的表象分析来加以言说,无疑是不充分的,也遮蔽了进一步揭示这一转变原因的可能。

如同要揭示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就必须回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社会物质层面,新的从属转变的指认如果要获得其批判范式上的讨论意义,也必须在物质性基底层面寻找其模式的转变。对巴里巴尔“总体从属”概念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后最终会发现这一转变的实际发生正是在资本与媒介权力媾和的基础上。

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领域资本化的转变,在其运作的标准化评价体系、持续

纳入医疗进程的生物指标等单向度的优化逻辑的社会建构中,经由数字媒介实现的基于大量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充分可预测性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人生存处境的一部分,当人被预置为人力资本和医疗需求时,人已经首先在媒介体系中被生产为媒介化的生命。库克里克(C. Kucklick)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揭示为数字化解析-解体基础上的控制革命,其中的个体都作为媒介化的生命而存在。以医疗领域为例,患者被量化指标解析为数字化单体并纳入预定的优化逻辑的过程,正是其典型体现:“在美国,大约2/3的成年人至少会掌握一项关于自己的数值,要么是血压、血糖,要么是体重或者其他指标……每一个人都将是一个孤本,一个单体,而且他们正是作为这样的单体而得到医学上的治疗。”(库克里克,2018)同样,将这种资本掌控构序下的优化逻辑推展为社会接受的运行逻辑的过程,也离不开媒介体系的运作。在《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斯蒂格勒揭示了社会意识的接受过程正是社会个体的意识被媒介第三持存深刻影响的过程,而电影、电视、数字网络等数字媒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即时性和普遍性将社会意识整合为媒介权力统摄下的巨流,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图式借此成为整个社会持存集体记忆和投映意识前摄的基础(斯蒂格勒,2016b),而个体主体投映能力在媒介持存意识流取代下的丧失——斯蒂格勒所说的“精神的无产阶级化”——正是总体从属所指认的通过对需求的生产实现资本增殖的前提。

在这一媒介基础上的资本掌控构序下,人的生活和生命无所不在地被置于资本逻辑之下,人失去了自身投映真实欲望和谋划自身生活的能力。除了当下的生命,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前摄也被吸纳到资本增殖过程中,因而当代的社会主体无法在资本生产的意识巨流裹挟中找到自身位置和自我效能感的“存在之痛”与异化感也就无法避免了。

如果结合前文所讨论的媒介场境的垂直权力构序,对总体从属更加合适的提法应是“深度从属”,因为从属的权力运作过程不仅仅是在平面上拓展了范围,更是在纵深层面转变了运作方式,从而将资本掌控提升到空前的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对从属的讨论亦同时延伸到资本主义掌控构序在空间领域中的转变。“形式从属—实际从属—深度从属”的进程,在空间上也就呈现为“分散—集中—弥散”的变化,弥散不同于形式从属阶段由于资本掌控构序范围和掌控力上的有限而形成的消极边界外的分散境况,而是资本掌控构序借助媒

介的垂直布局实现的更加彻底深入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渗透,也正因为如此,资本的掌控更多以不可见的形式运转。

(三)走向肯定性的媒介化:媒介的再发现及其重塑力量

对于媒介化进程,除了技术主义的盲目乐观倾向,现有的理论分析大多着意于对媒介化的否定性批判。前文提到的韩炳哲对媒介化的描述,几乎将媒介化场境当作摧毁一切秩序、权力乃至人自身的荒漠,祖博夫和帕克斯等人也将媒介当作资本和政治控制个体、实行霸权的工具。然而,借用贝尔纳·斯蒂格勒在访谈中的一段话:“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摧毁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从这两端之间走过去寻找真正的问题。”(斯蒂格勒,2015)否定性批判固然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媒介化暴露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但当涉及当下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及寻求人、社会与媒介的合理关系时,全然否定性的批判便显现出其无力的一面。

在这一语境下,讨论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既不能抛开既有媒介理论对媒介化的讨论,也不能忽视媒介在当下已然作为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场境这一状况。因而,首先必须回应既有的否定性批判,并从中寻求在逻辑和现实层面超越这些否定性的可能。

在此,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探究,试图在对既有媒介批判范式常见模式讨论的基础上,展现对媒介再发现的可能。

其一是人本主义的媒介批判。这些媒介批判首先预设了前媒介的纯粹主体性,而对于任何媒介对主体性产生的影响和干涉都首先采取抗拒的态度,如马修·福勒指认媒介环境学的实质是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其“怀有一种人类永续存在的想象,并试图确保这个世界对人类的安全性”(福勒,2019)。然而,这一范式的问题在于,这样的预设忽视了人的存在从来不仅仅是纯粹的存在,而是在与媒介的关系中共生的存在。斯蒂格勒曾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神话来表现人与技术在存在意义上无法割裂的关系。人的存在从来不是自源性、自足性的纯粹主体性,而是代具性的存在,其存在本身即为技术代具所分有,技术是人的真正先在性,“人在本质上作为技术性存在”(斯蒂格勒,2012a)。拉图尔也曾批判人类主义者“通过贬低物、贬低客体、贬低机器”(拉图尔,2010)的方式将人归为某一本质,而实际上人类与机器本身即具有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人类“将自身化身于机器之中……它甚至用机器来建造自己的身体”(拉图尔,

2010)。尤其在当下的数字媒介时代,人的存在与媒介更加深度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人必须被视为与其所关涉的媒介共生的共同体或结晶体,正如人的身体本身是无数微生物的共生体一样。同时,人的主体性,如前所述,也需要在媒介场境的关系中得以确立。

其二是自由个人主义的反治理批判。这些媒介批判预设了自由与治理之间的对立,将一切治理不经反思地预设为对个体自由的侵害,因而对于经由媒介而得以运行的治理权力,这一批判范式也延续了这一前提。如本雅明·布拉顿所批判的以祖博夫为代表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反监控话语,这些话语的内在前提是“我们首先是自我主权的个体,带有与生俱来的在自我同一性边界之中的隐私”(Bratton, 2021)这一信念。然而,一方面,这一范式忽视了自由实际上首先是在一定历史现实语境中的自由,并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来空谈抽象的个体自由;另一方面,这一范式也忽视了必要的治理对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社会危机时,这一范式将暴露出其符号化、象征化的自由个人主义话语的脆弱性,在布拉顿所谓的“真实界的复仇”面前不堪一击。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媒介批判模式都是超历史性的,或者预设超历史的纯粹主体,或者预设超历史的个体自由,而并未真正将媒介反思置于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中,本质上是一种以预设的应然批判实然的思路。这样的批判虽然提供了一种反思向度,但实际上与严谨的反思相距甚远,也难以从中产生建构性的力量。

其三是将媒介还原到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批判中,将媒介的可能性仅仅视为服务于既有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工具。祖博夫对监控资本的批判和帕克斯对垂直媒介霸权的批判都存在着这一倾向。诚然,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当代媒介的垂直构序为权力的深度掌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其与资本、政治权力的不当媾和,正在生产深度从属于掌控构序的媒介化生命。

然而,媒介体系的内在驱动力和生成性,本身并不能还原到既有的资本或政治权力中。媒介自身的运行逻辑固然在很多时候从属于既有权力逻辑,但这并非一种融合的同一,而是存在内在张力的复调构序。

在《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中,马修·福勒所举海盗电台的媒介生态案例,或许是这种张力显现的一例。海盗电台本身是游走于合法边界的媒介生态,在与对其进行压制的权力的对抗中,海盗电台通过各种媒介

超越既有模式的创造性组合和运用,形成了与试图规制它们的力量“共同进化”(福勒,2019)的关系,其媒介生态中内在生成的“无关联的集体主体性,是通过多样化媒介形式,排列于多样化制作网络、多样化运行地点之中的。这种主体性是在各种关联中被动员起来的”(福勒,2019),而在权力对其的压抑中,“因为那些拒绝屈从的场景及节奏动感驱动力,它被维持了下来”(福勒,2019)。媒介体系自身的生成性赋予其一定的不可还原的独立性和抵抗性,而这种生成性的力量在生成权力构序的同时也在生成逆构序的可能性,生成权力构序之外的敞开的可能性。

媒介体系,在可以被权力构序利用的同时,也将是冲破和重塑构序的生成力量,而它的可能向度需要在历史现实的具体语境中不断被重新发现和拓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适当地重提和借用拉图尔的问题:“威胁来自何方?”(拉图尔,2010)媒介的生成性力量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威胁,威胁来自试图将媒介归为某一本质之人,通过对媒介某一向度的固化和垄断,遮蔽了人类与媒介合理共生的其余可能。走向肯定性的媒介化的第一步,就是走出超历史的和还原论式的媒介批判范式,重新在生成性的向度发现媒介,在本体论层面认识和把握媒介构序的复调性。在这一基础上借由媒介生成性驱动力,重新塑形既有构序以及由此生成的新主体性,方有可能走出被数字资本异化的宿命。

参考文献

- 车致新,2019,《浪漫主义作为媒介技术——基特勒论“话语网络 1800”》,《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第3期。
- 福柯,米歇尔,2018,《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福柯,米歇尔,2021,《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福勒,马修,2019,《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麦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海德格尔,2018a,《巴门尼德》,朱清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2018b,《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2018c,《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韩炳哲,2019,《在群中》,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基特勒,弗里德里希,2017,《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库克里克, 克里斯多夫, 2018,《微粒社会》, 黄昆、夏柯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 拉图尔, 布鲁诺, 2010,《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刘鹏、安涅思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资本论》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麦克卢汉, 马歇尔, 2000,《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斯蒂格勒, 贝尔纳, 2012a,《技术与时间(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裴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斯蒂格勒, 贝尔纳, 2012b,《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方尔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斯蒂格勒, 贝尔纳, 2015,《独家专访德里达弟子斯蒂格勒: 被大数据裹挟的人类没有未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9683。
- 夏瓦, 施蒂格, 2018,《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刘君、李鑫、漆俊邑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许煜, 2019,《论数码物的存在》, 李婉楠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亚里士多德, 1959,《形而上学》,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一兵, 2018,《败坏的去远性之形而上学灾难——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哲学研究》第 5 期。
- 祖博夫, 肖莎娜, 2020,《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温泽元、林怡婷、陈思颖译,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社。
- Balibar, E. 2019, "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 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 in Peter Osborne, Éric Alliez & Eric-John Russell eds.,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Aspects of Marx's Capital Today*, London: CRMEP Books.
- Bratton, B. 2015,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IT Press.
- Bratton, B. 2021,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London: Verso.
- Kittler, F. 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Michael Metteer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ttler, F. 2009, "Towards An Ontology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6 (2-3).
- Parks, L. 2018, *Rethinking Media Coverage: Vertical Mediation and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outledge.